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裸浴场上的交响音乐会

罗马尼亚20世纪小说精选

[罗马尼亚] 诺曼·马内阿 / 等著

高兴 / 等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Norman Manea și alți autori

Concert simfonic pe plaja nudistilor-
Antologie de nuvele și povestiri romane contemporane



CONCERT SIMFONIC PE PLAJA NUDISTILORE
ANTOLOGIE DE NUVELE SI POVESTIRI ROMANE CONTEMPORANE

裸浴场上的交响音乐会

罗马尼亚20世纪小说精选

Norman Manea si alti autori

[罗马尼亚] 诺曼·马内阿 / 等著
高兴 / 等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裸浴场上的交响音乐会：罗马尼亚20世纪小说精选 /
(罗) 诺曼·马内阿等著；高兴等译。— 广州：花城出
版社，2018.12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第5辑)
ISBN 978-7-5360-8782-8

I. ①裸… II. ①诺… ②高… III. ①短篇小说一小
说集—罗马尼亚—现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罗马尼亚—
现代 IV. ①I54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0110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图字19-2018-072号

Copyright © 2018, used by permission of COPYRO COLLECTIVE MANAGEMENT SOCIETY
'Puloverul' and 'Ceaiul lui Proust si alte povestiri' by Norman Manea. Copyright ©
2016, Norman Manea,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

出版人：詹秀敏

丛书策划：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夏显夫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供图：子夏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裸浴场上的交响音乐会：罗马尼亚20世纪小说精选

LUO YU CHANG SHANG DE JIAO XIANG YIN YUE HUI: LUO MA NI YA 20
SHI JI XIAO SHUO JING 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 2插页

字 数 260,000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h.com.cn>

裸浴场上的交响音乐会

罗马尼亚 20 世纪小说精选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图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产生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克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问。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来自多瑙河畔的小说之声

(中译本前言)

高兴

罗马尼亚人，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异类。它实际上是达契亚人与罗马殖民者后裔混合而成的一个民族，属于拉丁民族。历史上，长期被分为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作为弱小民族，长期饱受异族侵略、统治和凌辱。十九世纪起，借助于几次有利的发展机遇，罗马尼亚文学出现了几位经典作家：诗人爱明内斯库、剧作家卡拉迦列和童话作家克莱昂格。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尼亚文学始于那个时期。一九一八年，罗马尼亚实现统一，进入现代发展时期。

由于民族和语言的亲近，罗马尼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一直深受法国的影响。一到布加勒斯特，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法国文化的影子。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布加勒斯特甚至有“小巴黎”之美称。那时，罗马尼亚所谓的上流社会都讲法语。作家们基本上都到巴黎学习和生活过，有些干脆留在了那里。要知道，达达主义创始人查拉是罗马尼亚人，后来才到了巴黎。诗人策兰，剧作家尤内斯库，音乐家埃内斯库，雕塑家布伦库西，文学家和哲学家齐奥朗，也都曾在罗马尼亚留下过自己的人生印迹。

统一给国家和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异常的活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文化，包括哲学、文学和艺术，曾出现过空前的繁荣。一九四七年底，罗马尼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紧随苏联，全面推行苏联模式。极“左”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文学自然也无法幸免。文学评论家阿莱克斯·斯特弗内斯库在其专著《罗马尼亚当代文学史：1941—2000年》中形象地说道：“文学仿佛遭受了一场用斧头做的外科手术。”罗马尼亚文学因而出现了严重的断裂。这一阶段，黑暗又荒诞，被罗马尼亚文学界称为“苦难的十年”。

六十年代中期，罗马尼亚文化生活开始出现相对宽松、活泼和自由的可喜景象。享有世界声誉的罗马尼亚小说家诺曼·马内阿曾在随笔集《论小丑》中比较客观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情形：

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这相对“自由”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并不繁荣，也不能说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毫无拘束。但是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里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用轻快的拉丁语哼唱，动听而有趣；你可以更自由地四处走动，更自由地谈论别人和书。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人们和书籍一起死而复生了——和谐的交谈、快乐的聚会、忧郁的漫步、令人兴奋的探险，一切都回到了生活中。这种变化，并不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是回

应领导阶层政策的变化而重新出现的政治热情，而是把政府的政治日程抛在一边短暂地回到简单的生活乐趣中。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一直喜欢的是歌声，而不是祈祷和庄严的宣誓。这个时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微乎其微，但它对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却延伸到了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触西方的艺术和思想运动，在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我们可以保持比较独立的立场，可以用个人的方式表达观点。

这一时期已被史学家公认为罗马尼亚的政治解冻期，有罗马尼亚评论家称之为“布加勒斯特之春”。可惜，始于六十年代初的开明时期没有一直延续下去。进入七十年代，文化再次面临严峻的时刻。

极富意味的是，八十年代的罗马尼亚文学竟始于一起重要的文学事件。一九八〇年春，马林·普雷达的三卷本长篇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出版，轰动了整个罗马尼亚文坛。人们争相购买传阅，报刊纷纷介绍评论，一时间，几乎所有阶层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世上最亲爱的人》。然而，残酷的命运未能容许作者充分地享受成功的喜悦。小说出版仅仅几个月后，作者竟出乎意料地去世了，年仅五十八岁。于是，这部“罗马尼亚二次大战后最受欢迎，最为流行的长篇鸿作”便成了作者的“临别之言”。

《世上最亲爱的人》在形式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创新。引起评论界关注的则是它巨大的容量。表面看来，这是一部描写爱情悲剧的小说，但仔细一读，读者便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部“无所不包”的鸿著。整部作品就象一座庞大的立交桥，各种阶层的人物，各种社会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此交汇通过。在这部长达一千二百页的作品中，作者的笔自由驰骋，从主人公的书房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从大学教研室到作家联合会的会场，从酒吧到妇产科病房，从监狱到灭鼠

队，就这样成功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苦难的十年”中整个罗马尼亚社会的全景。作者意在通过描写特定时期中一个普通人的悲剧来揭示整个民族的悲剧，因为个人的命运是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在罗马尼亚，描写“苦难的十年”的作品比比皆是，但以文学的形式如此全面地反思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则为普雷达首创。小说家实际上承担起了历史学家的重任，而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说过这样一段话：“艺术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这种替代现实拥有各种即便不能被完全理解，亦能被充分想象的完美征兆。”夹缝中的生存需要勇气、坚韧和忍耐，更需要一种有效而智慧的表达。时至八十年代，罗马尼亚小说已经成为一股成熟而又难以阻挡的力量，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自己隐秘却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毕竟处于欧洲文学的包围之中，毕竟有过六十年代的敞开和储备，即使在专制时代，罗马尼亚的文学生态也并不像如今某些西方人士所描述的那么糟糕、恶劣，并没有出现过如中国“文革”那样万马齐喑的极端局面。用小说家格奥尔杰·克勒齐恩的话说，“那时，虽然压抑，但还可以忍受”。文学，我们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始终在那片国度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空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作家一直在不断地出现。

一九八九年年底，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剧变之风暴同样降临罗马尼亚。剧变后，罗马尼亚开始朝市场经济转变，文学不断地被边缘化，不少作家的创作也陷入困境。这是个相当艰难的过渡时期。全球化和商业化同样冲击着罗马尼亚文化。在资本横行的时代，诱惑和困惑，机遇和挑战，几乎同时存在着。如何保护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如何体现小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何为陷入困境的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是许多罗马尼亚作家正在思考的问题。

罗马尼亚现当代小说就在如此的历史、文化和政治风云中走过了百年发展历程。

综观罗马尼亚二十世纪小说，长篇小说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许多作家都以长篇巨制获得影响和声名，从而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利维乌·雷布雷亚努的《伊昂》《绞刑森林》和《起义》，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的《马蹄铁·尼古阿拉》《安古察客栈》《斧头》，马林·普雷达的《莫洛米特一家》和《世上最亲爱的人》（三卷本）、乔尔杰·博勒耶泽的《两天的世界》、尼古拉·布雷班的《患病的动物》、欧金·乌力卡罗的《乌村幻影》等长篇小说就是绝好的例子。

这些优秀的小说家除去长篇小说，同时也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此外，在百年历程中，有一批作家，立足于主流之外，不求名利，只顺从文学和内心的呼唤，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短篇小说的创作。他们将笔触伸向日常生活，伸向内心和情感世界，关注普通人物，关注所谓的“琐碎题材”和“微小主题”，或者充分调动想象，以象征和寓言手法迂回地反映生活和世界。他们重视文学形式，重视叙述角度和手法，重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把艺术价值放在首位，同时也并不忽略社会效应、道德力量，以及同现实的连接。通过文学探索和实验，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对日常灰暗的抗衡，对教条、空洞和专制的反叛，也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动力。安东·霍尔班、诺曼·马内阿、阿德里安娜·毕特尔、勒兹万·彼得雷斯库、米尔恰·内德尔丘、斯特凡·阿果彼安、索林·普雷达便是他们中的代表性作家。尽管文学追求相似，但他们各自的写作又呈现出了强烈的个性色彩。有些人选择寓言体写作，曲折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比如阿果彼安的《兵法》。有些人深入内心挖掘、探幽，呈现种种令人惊异的内心和情感世界。比如安东·霍尔班的《祖母正在死去》、欧金·巴尔布

的《新娘》、诺曼·马内阿的《毛衣》、欧金·乌力卡罗的《爱情故事》和索林·普雷达的《正方恋》。有些人注重语言和形式革新，用独特的视角和手法来贴近社会和人心，以小见大，反映现实景况。米尔恰·内德尔丘就是这类作家的杰出代表。有些人善于将现实和梦幻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亦真亦幻的艺术氛围，往往既具有诗情画意，又充满人生蕴含，颇为耐人寻味。比如斯特凡·勃努内斯库的《从前的暴风雨》和玛丽娅·卢伊扎·克利斯戴斯库的《克洛丽丝》。还有些人用轻盈、幽默和讽刺的手法表达精致的思想和微妙的情绪。比如格奥尔基·施瓦茨的《小小说选》和贝德罗斯·霍拉桑捷安的《精美食品四道》。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也听出了各种语调，感到了各种气息，看到了各种风格。反讽，神秘，幽默，魔幻，沉重，哲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派，等等等等，正是这些写作上的差异，让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于文学而言，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重要。而不同的声音的交融，便让文学有了交响乐般的丰厚，以及马赛克似的绚丽多彩。

我向来对“大国文学”和“小国文学”这一概念保持警惕甚至怀疑的态度。大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学的优越；而小国，也并不见得就意味着文学的贫乏。事实上，在读了太多的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之后，我一直十分地期盼能读到一些小国的文学，比如非洲文学，比如北欧文学，比如中东欧文学，其中当然包括罗马尼亚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文学中，或许还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一种质朴却又独特的气息，一种真正属于生命和心灵的气息。而全球化背景，恰恰极容易抹杀文学的个性、特色和生命力。

然而，语言的障碍却明显存在着。因此，我不得不承认大语种文学和小语种文学这一现实。这一现实，更多地体现的，是文学在流通上的尴尬。这也就让小语种文学显得格外难得和珍贵。而罗马尼亚文